

回眸外交风云,评点现实挑战

朱威烈

一、《中阿五十年外交风云》序:是纪念文集,更是历史文献

由《解放日报》国际部发起并支持、外交笔会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组织并完成的这本文集,旨在纪念中国—阿拉伯国家关系最近半个世纪(1956~2006)所跨越的光辉历程,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在中阿合作论坛外长会议结束后不久付梓问世了,真正是可喜可贺。这本文集的作者,是一批我国长期驻阿拉伯国家的资深大使,以及几位多年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成名学者。他们中,大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不但德高望重,而且经验学识都远非我所能企及。因不敢有违文集主持方之托,遂不揣冒昧,在这里稍谈几句对中阿关系五十年的粗浅认识。

追溯当代中阿关系的发轫,我想,首先应归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外交理念——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的创新,最突出是由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求同存异精神。

据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黄桂芳大使回忆,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接见来北京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后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中国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新世纪初世界大势纵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接着,1954年4月18~24日周总理在参加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期间,面对各国对我国政策的疑虑或误解,反复强调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从而扫除了阴霾,受到了与会亚非国家的信任和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凝聚成为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观,

不但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基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的稳定、发展,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且直接为中国外交赢得国际社会首先是亚非国家的广泛认同创造了必要条件,为拓宽我国的国际发展空间特别是进入西亚非洲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从1956年5月底起,中国与埃及、叙利亚、也门次第建交,到1990年7月最后与阿拉伯世界中的沙特阿拉伯建交的全过程,以及五十年来中阿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取得的长足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的阿拉伯国家,战略位置突出,又是人类古代文明和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祥地,从来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群体。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大规模向亚非扩张势力,中东地区的油气资源的大量被发现和开采,阿拉伯国家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成为大国角逐、争夺或竞相争取的对象,其大国关系互动的舞台作用也随之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本书27篇专文的阐述、论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我国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这五十年,充满了中国外交丰富多彩、成效卓著的生动实践,不但特色鲜明,而且经验良多,建树不凡,谱写了人民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段佳话,一篇篇华章,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这里,仅以我的管见所及,略述一点体会。

首先,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关系五十年,清楚地反映了我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品质。从1956年与埃及建交肇始,至1990年完成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先后通过三次高潮,成功地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详见本书杨福昌大使:《中阿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冷战结束后,我国准确把握住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先后与阿拉伯国家构建起面向新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或

战略合作关系，到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宣布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及是年7月温家宝总理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财长与海合会秘书长，签订双边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开始启动中国与海合会建立自贸区的谈判。其间，由个别到整体，由局部到全面，由双边到多边的发展轨迹，都经历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客观科学的判断和务实周详的部署过程，从而推动了中阿关系不断地稳健提升，这不但符合双方的利益和需要，而且也跟上并适应了区域化合作和全球化形势的发展步伐。

其次，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始终具有明显的总体性。杨福昌大使在他的专文中指出，中埃“两国建交的政治基础是反帝、反殖、支持民族独立的共同立场，建交的过程经历了相互了解，先民间、后官方，文化、经贸开路，最终导致政治上建交”。这说明，中阿交往和合作的这五十年，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相互认同和取得共识乃是基础，但交流合作从一开始就不限于政府外交政策层面，而是包括了民间，涉及到文化、经贸等其他领域，事实上，这五十年期间，中阿双方的互访、交流和合作，已扩展、深入到经济、贸易、能源、劳务、工程承包、投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新闻、青年、妇女、旅游和宗教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阿拉伯国家数量多，国情各异。它们面积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国力强弱、贫富相去甚远，有的是地区政治大国或油气输出国，有的是文明古国或劳力输出国。它们的需求、利益取向和关注点不尽一致，需要我们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的。五十年来，我国始终重视发挥和调动国内各有关部委、省市和行业的专长和积极性，做到统筹兼顾，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取得了堪称丰硕的成果。一代又一代中国优秀的外交官是骨干，位居主流，其作用与贡献，向为阿方称道，自不必言，即便是以医疗队、体育、杂技教练组、修路组、打井队等形式派出的工作人员，也都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声誉，他们为阿拉伯人民真诚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与事迹，至今在当地留传、受人称颂。此外，2001年12月21日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构筑起了政治、经济、文化三条学术对话渠道，使我国的对阿外交更趋完善，双方的合

作内涵益发丰富。

第三，是我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话语体系，也与某些西方大国截然不同。五十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有自己的视角、原则和方式，即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出发，依据平等、互相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阿拉伯各国的政党、政治组织和民间团体发展交流与合作。这种尊重与平等相待，源于中阿深厚的历史文化，延续至现当代，又得到了更深、更广程度的发扬。中阿自古就有交往，丝绸之路满载着互通有无、互助共荣的历史故事，进入近现代，双方又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任务。因此，中国尊重阿拉伯民族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尊重阿拉伯人民对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选择，既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基本原则。反映在话语体系上，中国对阿交往也就从来不带有殖民地宗主国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语汇和口吻，从来就不曾有过用武力相威胁，强迫对方去接受他们并不认同的价值观，去进行违背他们心愿的强制性改造。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都在讲求利益的当代，我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重视利益交换，有自己的利益话语，但这种话语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互利共赢，是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而非唯利是图，只谋一己之私、不顾对方的损人利己。事实上，中阿交往五十年，双方已经形成了一套共同话语，那就是总要讲历史传统友谊，讲共同的遭遇和任务，讲文化、价值观中的相似点，讲对和平、正义和进步的共同追求。这套话语从宏观上看，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是中阿关系五十年的共同财富，值得双方珍惜，继续用来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中阿关系五十年，要总结、归纳的内容极为丰富，上述管窥蠡测，只是想表达一个心愿——希望日后能有我国的外交家或学者来编写一本中阿外交史专著，深化我国外交学的学科建设。

这本文集中汇聚了这么多位高级外交官和教授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性资料，尔后认真撰写的文稿，是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能为之作序，真正是与有荣焉。这里谨向所有的作者表示我的敬意和祝贺，因为他们已为中国对阿拉伯国

家外交史作出了贡献,也向外交笔会、《解放日报》国际部和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学术部的负责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一年多来的筹备、组织和悉心主持,就不可能有本书的顺利问世。

二、《半岛台的挑战》序

今年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创办10周年。由黎瑞凤、孙伟等先生翻译的《半岛台的挑战》即将付梓问世,不啻是一种庆祝。我作为一名从事阿拉伯语工作逾40年的教师,心中也甚感欣幸。

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世界的新生事物之一。阿拉伯国家虽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有卫星电视,数量也颇可观,但半岛台的异军突起,却不仅令拥有22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约2.7亿的阿拉伯民众耳目一新,而且也成为了国际传媒和舆论高度关注的对象。其原因,是它办得最用心也最有争议的新闻和谈话节目,不时地导致美国、欧洲国家的不满,邻国的指责和抗议,甚至造成外交关系的断绝。正因为此,半岛台10年来的发展轨迹充满了曲折,对它的评价也始终褒贬不一。

我因工作关系,每年都有几次阿拉伯国家之行。每到一地,收看的电视节目首选的总是半岛台。本书中说,半岛台“成为最多人收看的阿拉伯新闻频道,使得沙特阿拉伯的MBC排名滑至第二,而伦敦的ANN则降至第三”。其言不谬。半岛台滚动播放的新闻节目,确具特色。相比其他频道,它对最新事件或有关动态的报道,抢先意识强,播放也最快。有的消息,画面未到,文字摘要就已在屏幕出现,在循环放送过程中还会不断增加新的新闻要素。我有几次在国内外会见阿方官员,客厅里的电视频道就固定在半岛台,只是把声音放轻,以免影响谈话。但一当主人看到他关注的新闻,便会边招呼我一起看,边调高音量。他(们)这样做,我并不介意,因为对这个举世闻名的热点地区而言,新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中东地区除了各国本身原有的各种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矛盾,仍在继续交织、碰撞、激化和爆发之外,更由于9·11事件之后,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而遭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海湾战争后,1993年9月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订了奥斯陆协议,和平进程曾取得过阶段

性的进展,但2000年9月底以色列利库德集团又一次引爆了巴以冲突,阿拉伯世界最关注的巴勒斯坦问题,5年多来已被定点清除和暴力事件所掩盖;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更是前缺公理、后失道义,就连已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阵营中决裂出来的弗兰西斯·福山都认为“从理论和现实上都是错误的”,伊战的后遗症十分严重,3年多来,伊境内的武装袭击、恐怖事件、教派冲突接连不断,社会秩序和治安迟迟不能恢复;阿拉伯各国一面要应对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并竭力设法缓解美国2004年初提出并推行的“大中东计划”所造成的外部压力和干预,一面也努力自主启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以跟上全球和平发展的潮流,平息社会各阶层民众的不满。可以说,阿拉伯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严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什么和怎样报导,无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日日夜夜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对半岛电视台的各类节目,出现意见分歧,乃是很正常的事情。

半岛电视台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也许正如书中所说,是沿袭了原先办在伦敦的BBC阿拉伯台的传统,要让“阿拉伯人……观看阿拉伯记者制作的与西方新闻频道同等标准的新闻和节目”,其标准是“新闻价值、准确性和客观性”。然而,当前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统一的价值观,各国的制度、国情、民情差异也大,所谓“新闻价值、准确性和客观性”,都只能相对而言,各国媒体报道理当顾及对象国的实际,不应干涉对方的内政。何况,即便是美国、西方,它们奉行的也从来都是双重标准。半岛台之所以常常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引发争论、争端,一是过于相信西方标准的所谓客观性,二是与主办国卡塔尔的颇具特色的国家追求分不开的。

我近年访问过几次卡塔尔,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它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速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在阿拉伯国家中都堪称一马当先。书中提到了卡塔尔的人均收入、美军基地等情况,都是事实,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真正拥有卡塔尔国籍的居民,还不到GDP统计人数的一半。我2002年初去访问时,卡全国人均GDP已超过2万美元,这是把外来务工人员都统计在内的数字,在富庶的海湾产油国中,也名列第一。另外,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

特，海湾危机爆发，接着是海湾战争，这使得美国因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撤离海湾以来，重获机会实现了它在这块战略要地的军事存在。自此之后，沙特、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等国都建有美军基地。伊拉克战争前后，美在沙特的军事基地使用情况出现变化，美指挥伊战的中央司令部不得不迁至卡塔尔。至今，卡塔尔美军基地承担实施美国地区战略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变。换言之，卡塔尔是美当前在海湾地区最可靠的盟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由于卡塔尔国人少，天然气蕴藏量多质优，拥有极其雄厚的财力，安全状况又有美军予以保障，因而埃米尔政府谈论民主选举、自由、人权等地区国家颇具争议的话题，并不会在 30 多万养尊处优的本国居民中造成多大分歧。近年来卡政府的一大抱负，是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加快构建它在海湾地区独树一帜的国家形象。从外表上看，多哈每年都在增加的豪华场馆、饭店鳞次栉比，举办国际、比赛和展览接连不断，已是地区重要的国际会展中心。从内涵上看，卡塔尔举办的“多哈民主、发展和自由贸易论坛”已历六届，影响逐年扩大，明显反映出卡塔尔充当阿拉伯世界改革先行者的意向。去年，在联合国改革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卡塔尔外交部正式表示卡要成为安理会的理事国。至于半岛台 10 年来一直敢于直面地区敏感问题，甚至不措损失广告、引起争执甚至外交事件，恐怕也在于卡塔尔政府一心想把它办成阿拉伯的 CNN，在国际传媒界崭露头角、跻身一流名牌的诉求。

简略地勾勒一下上述背景，是想有助于增加读者阅读这本译作的兴趣。原著虽然不乏美国观点，但内容却十分充实——资料、数据收集得充分而且扎实，所举事例丰富而且真实，贯串全书的地区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近年，为人们所熟知。写法也很生动——通过真人真事的讲述和描绘，读来决不会感到枯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实际上是一本研究

后撰成的作品，它不带多少学术痕迹，然而，从章节编排、条理分明的阐述，详简适宜的材料处理，都足以显示作者的功力。相信无论是喜欢媒体语言的读者，还是关心国际问题的各界人士，都会从中获得有益的知识、资料和启迪。

相比我国对美、欧、俄、日的了解和研究，实际从事或有兴趣深入研究中东问题的人员，实在是太少了。因此，每当看到我国中东问题研究书架上有新的著作和译作出现，我都会感到欣喜和振奋。新作不是表明又有新的作者、译者加入了我们介绍、研究中东问题的队伍，就是预示着将又有成千上万名读者通过阅读进一步增加他们对中东问题的了解。这在当前，尤显得重要，因为自我国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来，胡锦涛主席于 2004 年 1 月 30 日访问开罗阿盟总部时，宣布建立“中阿合作论坛”，随着中阿稳定的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阿拉伯国家在我总体外交中的地位 and 作用也已明显提升。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了解和熟悉阿拉伯国家方方面面情况，无疑是为持续地巩固和发展中阿关系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文基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好事。

同时，我也要由衷地感谢黎瑞凤、孙伟等先生选择翻译这本著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很清楚，凡涉及阿拉伯事务的书，常会涉及到大量阿拉伯制度和伊斯兰教的专有名词，人、地名也没有专门的译名手册可供参照，译者除必须拥有娴熟的语言能力外，还得花费不少时间去查阅、核对各种有关资料。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先生(1854~1921)称“译书三难：信、达、雅”，已成经典之论。惟在翻译阿拉伯内容的著作中，还常会碰到许多细节和技术上的困难，益增其难。本书译者能知难而进，卒底于成，诚可贺也。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